

访谈 | 白夏  
张崑

中国民主季刊

第3卷 第3期  
2025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在灰暗中寻找影子： 中国民主运动中的记忆、转变与希望



白夏



张崑

**编按：**“从五四运动到八九民运，每一次政治浪潮都承载着对自由与制度改革诉求，但又都在某种时刻被中断或挫败”，法国著名汉学家白夏 (Jean-Philippe Béja) 教授痛惜地说。白夏自 1967 年起学习中文，至今已与中国社会打交道超过五十年。他的研究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移民问题、政治运动与公民社会，重点观察中国社会运动的演变。

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旅居巴黎的历史学博士张崑对白夏教授做了专访。访谈从白夏的学术轨迹切入，围绕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民主历程、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挫折以及今日政治氛围中的“影子抵抗”展开，展现出一个时代的政治回响。

**张崑（以下简称张）：**白夏教授你好，感谢你接受采访。能否请你先向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学术生涯和研究兴趣？

**白夏（以下简称白）：**我是在 1967 年开始学中文的，当时我 18 岁。那正

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期。“造反有理”这句话对我来说既新鲜又震撼。另一方面，我也想接触与欧洲完全不同的文明，看看世界的另一面。所以我选择了中文，开始了与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关联。

那个时候我们无法前往中国留学，所有外国学生都被清退了。台湾也不在考虑之列，因为当时我们把台湾视为反动政权。所以我一直在法国学习中文和政治学。从巴黎政治学院毕业后，在巴黎七大的三年中文学习也毕业了。同时，我准备写博士论文。因为不能前往中国，又不想去台湾，我最终选择了研究 19 世纪旧金山的华人社会，探讨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族群身份与阶级关系。这也是我第一次将民族问题与社会阶层结合在一起考虑。

我的研究兴趣也来自对“革命”的信仰。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都深信马克思主义，我想通过学术去理解不同社会中民族与阶级意识如何互动。

后来我前往缅甸工作了一年半。我那时的兴趣是了解世界另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当然我去的不是部分知青奔赴革命的缅北。那时西方人能去的地方不多，除了仰光，就只能去曼德勒。一般游客就只能在缅甸待七天。我在缅甸居住一年半，已经是非常特殊的了。在仰光，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东南亚的华侨社会。他们的生活、庙宇、语言，让我受益匪浅，也大大提升了我的中文能力。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华人世界”。

1975 年，我进入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CNRS)，工作在巴黎政治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我也终于有机会前往中国留学，进修了一年中文和中国文学。之前，1969 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大”后，我看出革命已走向终结，反而演变为官僚主义的开始。我的留学地是沈阳辽宁大学，那里气氛极为“革命”，

是反修防修的前线，毛远新是省革委会重要成员，对我们外国学生充满防备。

我们被严格限制，不得自由与普通百姓接触。虽然后来还是有一些接触机会，但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对中国的制度比较失望了。我们每个学生都配有一个“同屋”陪住，但是你不能去他家，而且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可是我的初衷就是去和中国的老百姓建立直接联系，于是我学会了一个策略：“举着红旗反红旗”。比如用官方语言、毛主席语录来反对他们的决定，他们也不敢跟我们说不行。所以可以用毛主席语录来推动我的想法。这是我最早接触“策略性抵抗”的体验。

1976年的“四五运动”也令我震惊。当时我在中国，正在沈阳，那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是，4月7日，《人民日报》罕见地详细报道了天安门事件，虽仍使用“一小撮”、“别有用心”、“反革命”等措辞，但报道首次呈现了事件过程，真正地做了一个报刊的工作。这种真实，在中国媒体中是罕见的。它让我意识到，即使在体制内，也有真正的抵抗，而且还是公开的。我跟当时沈阳的中国同学讲起这些事情，想知道他们怎么想，我感觉他们可能很支持，但是不敢跟我说。所以我一直对这些运动感兴趣。之后，我在香港接触了一些像我这样年轻的研究者，也认识了一些大陆的偷渡客、包括知青等，他们开阔了我的眼界，更启发了我的思考。

后来我每年都会回中国，之后的民主墙运动同样吸引我。正是那个时候，我对中国社会的兴趣超过了对政权的兴趣，准确地说，对中国政权更多的是怀疑了。

此后我开始更系统地关注中国社会。在香港，我接触到许多以前的左派和右派、偷渡到香港的知青，他们给我解释他们的经历和反思，让我大开眼界，同时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中国的理解，也让我开始关注中国的民间社会运动，如“软抵抗”、“边缘行动者”等现象，以后也一直研究这个方向。

**张：**你曾撰写过一本探讨从 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百年民主运动的专著《寻找中国的影子：1919–2004 年中国民主运动史》。在你看来，这些运动之间有何连续性？是否构成一条历史演化链？

**白：**怎么说呢，我觉得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不断错失机会的历史。从五四运动到八九民运，每一次政治浪潮都承载着对自由与制度改革的诉求，但又都在某种时刻被中断或挫败。

五四运动的背景，抛开民族主义的部分，是一个政权未定型、思想大开放的时代，中国在探讨走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社会在各种政体之间试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袁世凯的个人专制、军阀混战中的地方割据……五四正是在这种动荡背景之下爆发的，表达了青年一代对国家前途和政治体制的焦虑。

1989 年也有一些类似的特点。虽然，政治体制仍是毛时代的延续，但是，从 1978 年，党在探讨，怎么巩固它的合法性。学生和市民的诉求，其实是在试图打破单一政党对社会的垄断，提出平等对话和开放的呼声。八十年代与五四时期的一个共同点，是探讨怎么组织一个政权，更符合中国的发展，当然要在共产党允许的范围内。你也可以说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但目的是探讨寻找一个合适的政权。可是，没有党内势力支持社

会势力，这样的努力是很难成功的。1966年、1976年的中国都还很封闭，但八十年代就非常开放了，人们什么思想都想要学，即使分不清好的坏的，还是什么都要拿来看一看。所以，八十年代引入了西方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学思想，是另一个思想启蒙高峰期。这一点和五四高度相似。

相较之下，1976年的“四五运动”则是一次“高压下的反弹”，但它的重要性在于，党内的开明派也有参加，虽然不是直接在第一线，但他们鼓励了这个运动，它标志着体制内开明派，或所谓的改革派开始与社会共鸣。而1989年运动的前期，运动支持党内改革派，同时也有改革派在背后，不那么直接地起到推动作用——虽然他们未必支持全面改革，但的确曾短暂地与社会运动同频共振。

这些运动之间的最大延续性，是中国社会中一再涌现的“自由渴望”：言论自由、组织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尽管形式各异，但这些诉求贯穿了一百年的历程。

**张：**1989年的民主运动可以说是一个高峰。站在今天回看的话，你认为那场运动的失败，对于中国社会参与政治的方式，造成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白：**六四之后，真正的改革派没有了，基本上是消失了，即使有想改革的，也已经放弃了政治改革，至少是不敢再提。可以说他们在党内是彻底失败了。即便有一些人继续存在，但那些所谓可以继续推进的改革，都是经济方面的。

政治方面，一个因素是因为八九民运和六四，另一个因素是苏联解体，两

个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共放弃政体改革。为什么？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不但没有成功，对共产党来说还是一个极大的失败。这就让中共看到，我们如果允许社会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就会引起轩然大波、走向苏东剧变，进而我们共产党的政权都会被推翻。

我个人觉得一部分的改革派接受了这个可能性，不再要求政治改革。只是同时，中共为了大屠杀以后恢复政权的合法性，还要给社会一点表达自己需求的空间。那就是邓小平 1992 年南巡的意思，但开放严格限定在经济领域。为了发展经济，需要一个市场，所以要加强对对外开放政策。当然，像邓小平说的，打开窗户，苍蝇蚊子都会飞进来，我们要冒这个风险。要控制这些风险，就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比如说，要坚持党的领导，那么就杜绝了多党制的发展方向，不能让别的政治组织有出现和发展壮大的机会。这样的一党专制，党内所有人都同意了，包括改革派。

事实上，即便在 1989 之前民主改革氛围最浓的时刻，改革派也是同意坚持党的领导的，而且 1989 民运的诉求中，也接受这一点。学生们要求的是与党对话，而不是要推翻共产党。但是对话就是承认一个独立的社会的存在，对中共来说，接受了这一点，一党专政就很难坚持下去。邓小平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如果要对话，由你们代表社会，而不再是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放弃了它对政治和社会的垄断，那么共产党就无法继续统治下去。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开始探索另一种路径——发展“非政治性”的社会行动，也就是所谓的“公民社会”。许多参与过八九民运的知识分子、学生和记者转向社会议题，如农民工权益、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这些议题表面上非政治，但实质上构建了一个“边缘公共空间”。

你说他们是“软抵抗”吧？他们比软抵抗还更积极一点，因为他们要创建一个公民社会，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从政治问题转向社会问题。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不直接碰政治，我不说我要创建民主，我只是通过我具体的行动，去创建一个独立的社会。

同一时期，2000年代互联网的发展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网络空间成为“软组织”的平台，使社会运动能够跨越地理限制，形成全国范围的松散连接。

最具代表性的，是“维权运动”的兴起。律师、记者、志愿者组成了一个跨阶层的网络，协助农民维权、工人讨薪、土地维权等。他们使用的是中国宪法和现行法律中的条文——比如“人权入宪”“基层民主”“依法治国”等——来挑战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或违法行为。

在这一时期，公民社会不仅是一种行动策略，更是一种精神空间。它表达出一个现实诉求：不谈革命，但要维权；不求颠覆，但要自治。这种“软抵抗”成为继八九民运失败之后，绕来绕去，中国社会又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诉求的方式。

这种运动策略非常巧妙，他们不是高举反对大旗，而是借助体制内的语言与资源来达成社会目标。这种方式一方面减少了行动的政治敏感度，另一方面也真正唤醒了部分基层群体的权利意识。维权运动成为一个跨阶级的运动，比如广东的太石村事件，有当地农民的抗争，也有知识分子参与，艾晓明去了，有律师、有记者，《南方周末》的也去了，这就变成了一个模式，我们可以说是公民社会的中国模式。

**张：**这个模式可以说也是一种基层民主的模式吗？比如当时太石村村民要求罢免村主任，起初是罢免成功了，也是用了像你说的“举着红旗反红旗”这样的策略：既然中央政府提倡基层民主，我们就按基层民主的程序，把它落实了。

**白：**这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这当然是社会利用政权的话语，来推动社会的诉求；另一方面，“人权”在2004年进入了宪法，“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同样也写入了那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所以，这两个概念也是公民维权可以利用的。既然政权你说要推广基层民主、保护人权，所以律师说我们就是要保护人权。还有农民说，你说承认了私有财产，那我就要维护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也要维护我的人权。所以，维权运动的模式是很聪明的。对政府来说，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高速发展中涌现出的社会矛盾；党内也有一部分开明派觉得，这可能也会加强他们的合法性，毕竟合法性是关键的问题，1989年之后，他们就一直有再造合法性的需求。

但是2012年以后，党内有人就觉得这个模式很危险，威胁党的政权，不能再让它继续发展。后来主政广东的开明派汪洋到了中央，做了政治局常委，但是这个模式已经结束了。

**张：**在这个民主运动当中，本来有这么一个大好的局面，比如说中共提倡基层民主，社会也形成了精英和基层的衔接。那后来又怎么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白：**过去民主运动中的一部分活跃分子，这时就转到了公民社会运动。很

多人都感兴趣、关注，还会写文章。比如说刘晓波就写过关于河南的孩子被绑架去山西黑砖窑的“黑窑童奴”的文章。各地都有群体事件，如农民反抗，这不属于正式的民主运动，但它借助互联网，形成了网络。从事公民运动的活跃分子把这些信息放在网上，他们之间互通有无，比如在贵州报道什么事件，遇到什么问题，请大家都来看，那么，就有更多的人从北京、成都、从各地赶过去声援。这些人很多是参加过八九民运的人，也可能因此找不到工作。他们不是专业的革命家，但是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人，有的后来成了记者，有的成了律师。他们有自己的朋友，相互通过这些公共事件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形成软性网络，从而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维权运动不仅仅是这个事件那个事件，更是一个真正存在的网络。

正是他们的这种社会衔接让党害怕，担心会重演八九民运。因为中共领导知道，他们的合法性是很脆弱的，尤其在六四大屠杀之后，邓小平南巡也是为了加强合法性，但是那之后的腐败横行，又损害了中共的道德形象。屠杀和平抗议的年轻人，就没有道德可言，再加上官民矛盾、群体事件，所以他们自己知道合法性不强，任何一种组织方式、任何一个新生力量，他们都非常恐惧，不允许它成长，所以他们抓了刘晓波。刘晓波对党一点儿威胁都没有，可是随着他从民运转向公民社会，他的影响力随着公民运动越来越大，尤其2005年以后，全国的公民运动活跃分子都知道他，可以说他跟整个中国的公民运动都有联系。而且，公民维权运动不是地下的，都是公开的：宪法讲公民人权、基本权利，而公民运动就是参与和推动宪法这些条款的落实。

**张：**那你怎么评价近年的维权运动？

**白：**近年还有维权运动吗？我觉得人还在，但运动现在很难找了。

**张：**的确，在连年高压之下，这种维权运动已经很难找了。但是作为民主运动，在中国还有没有？或者会不会用另一种方式在中国重现？

**白：**我的书名叫《寻找中国的影子：1919–2004 年中国民主运动史》。是影子的方式存在，影子哪里有？你有时看到、有时看不到，却抓不到它，但是它总是在。所以我的观点是不可能没有。

**张：**对，你这个“影子”的比喻非常巧妙。阳光之下，影子随处可见；阴云密布，就找不到影子。但是只要有一丝阳光，它就又回来了。

**白：**1966 年以后就有，可是你就是找不到，后来 1972 年、1976 年，它怎么又出来了？它不是从零开始的，只是在黑暗的时候你找不到它。

可是它不知道它的过去，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对民主运动来说，最大的弱点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前人做了什么。比如，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有一部分红卫兵就真正有这种诉求。例如杨曦光，他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当时是非常有力量的，不是被毛的意识形态所限制的。但是他不了解以前的民主运动，后来被打成反革命坐牢时才知道，发现了牢中的右派，原来他们以前也有过同样的诉求。后来 1989 年是最明显的，那些学生不知道民主墙。六四后他们来法国的时候，我见到他们，发现他们都不知道，包括吾尔开希。所以中国民主运动的问题是，每次都是从零开始，尽管他们的诉求基本上都是同样的，就是基本的自由和基本权利。其实这些诉求一直都有，以前也争取过，你不需要学孟德斯鸠或是谁的理

论。所以，没有连续性是民主运动一个非常大的弱点，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共产党，共产党却知道怎么对付你，所以他们相信你每次都会输。

**张：**六四之后，海外的华人社群，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保存了这么一种记忆？

**白：**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不是一个学术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海外深刻的研究民运的历史，当然有用，但是不能创造连续性。中共成功地擦除了斗争的记忆。另外，每个新一代的活跃分子，都以为自己比以前的要聪明。因为国内没有一个能避免擦除斗争记忆的组织，所以不容易积累经验。当然，海外组织、杂志可以发挥这个作用，但是它们在国内的影响有限。

我觉得这不是中国特色，因为西班牙、苏联也是这样。在共产党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国内相应的组织。比如西班牙，一个共产党和一个社会党，在海外继续吵架。由于国内也有一些以前的组织，也留有一些活动分子，他们还在那儿，国内外可以沟通，尽管仍然很难，但情况比苏联、罗马尼亚、捷克都好一些。中国在国内没有组织，就变得很难。

在这个运动中，很重要的是个人关系。个人关系没有变成群众运动，但是它保证了持续的交流。朋友圈、人际关系，这些不公开的网络还是存在，通过这些私人空间的讨论，也会有一些影响。如果用冰山来比喻你这个问题，那么，民主运动在海外的活动，好像完全是走自己的路，和国内没有关联，但其实它是冰山一角，水面之下有多少，可能不好说，或者不要去说也好。所以，国内对海外民运，有很多人是失望的，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参加，也联系。现在你问我维权运动变成了什么？可以借托派用的“低潮”这个概念，维权运动也有低潮。所以现在要保持人的存在、那些非常

模糊的网络存在。刚才说每一次都是从头开始，所以记忆是非常重要的，海外也能延续这个记忆。

国内曾经有很多刊物，比方说有个杂志叫《记忆》，以前还有铁流的“往事如烟”、《炎黄春秋》等等，一直到2016年，也是发挥这个作用。现在尽管很难，但还是有人发现了这种历史记忆对整个运动的重要性，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有进步。

**张：**那么像2014年占中运动，2019年反修例运动它们在香港社会产生剧烈反响，因为你也研究香港，你怎么看这些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的结构和政治诉求，他们与内地的民主运动有什么样的关联和断裂？

**白：**理解2014年和2019年的运动，要回看到早一点的历史，我觉得从1970年代初，在香港就出现了一个政治文化和政治共同体。

**张：**1970年代初？

**白：**对，就是从1970年到1974年，出现了要求中文作为官方语言的一个运动，也有保钓运动。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个“香港意识”。以前，香港是一个难民的跳板，就是你去香港，是为了去另外一个地方，去英国、去加拿大。但是我的这一代--1949年出生的这些人，1963年以后不能随便移民到英国，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也不能去中国，别的国家也开始闭门，所以你在香港就不能离开香港，香港就变成你的祖国。以前，香港的政治运动，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完全是一个中国政治的微缩舞台。后来香港人就觉得要关心香港，自己组织自己的政治。你看香港到处都是

英文，为什么是英文？我们 95% 的人是中国人，我们要有中文！让中文变成一个官方语言，就是在中大开始的。通过这些运动，有一批人就开始对香港有反思，有一个政治态度：我们要做点什么。

后来 1980 年代，在中英谈判的时候，中国利用香港人来反对英国殖民者，对它施加压力，所以中共建立的机构，除了亲北京的代表，也选择了一部分将来要变成民主派的代表。比方说，司徒华、李柱铭，他们都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有的是来自保钓团体的，也有一些是工会的，但是，不完全听北京的，他们对英国施加压力，要求民主化。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政治文化。它的政治诉求是要求民主。

这之后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八九民运。那时香港人就希望，如果大陆变成民主制度，回归了，那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所以中国的民主化对香港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就有了那么多的香港人出来支持民运。

后来六四大屠杀发生，在支持民运的支联会演唱会上，支联会的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在，包括很多亲共产党的。所以整个香港政治共同体的生日就是六月四日的大游行示威。那时有八号台风，一般来讲八号台风是不能出门的，可是那一次，五十万人上街。

**张：**香港政治共同体的生日？

**白：**也可以说是香港民主运动的生日。那个时候的口号是什么？“今天的北京是明天的香港”，所以为了保持香港需要有民主。之后维园的六四大聚会每年都有，一直到 2020 年还有十万多人参加。

**张：**在这之前，香港的民主派向英国争取民主，这之后，变成向大陆争取？

**白：**当然英国已经开始让步了。所以，即使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对他来讲中国民主事业还是非常重要的。

**张：**民主认同超越了民族认同？

**白：**李柱铭是代表英国文化的，司徒华代表中国文化的，他的草书非常好。所以民主运动给了香港一个特殊的认同：香港跟大陆不一样，跟英国不一样，我们要保持这个特殊性，而只有民主才可以保持住这个特殊性。从1991年起，香港每次选举泛民主派都拿到了60%的票，这说明他们真正代表香港人民。

这一点，对理解2014年和2019年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基本法决定2007年以后，特首要由普选产生。2013年一月，一部分泛民派发起一个争取普选的运动。2014年8月31日人大常委会有一个决议说，选举委员会要选择候选人，这个选举委员会完全是北京控制的，所以引起了很大的不满。过几天，学生开始占领香港的街道。那个时候一批年轻人开始批评泛民派，认为他们过分关注的是中国的民主化，不顾香港。所以他们提倡所谓“本土化”，决定不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纪念的六四活动。

**张：**强调自己是香港人的本土派，是占中运动之后出现的？

**白：**占中之后开始发展的，到了2019年就比较强了。所以，它是个香港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我觉得对一个政治学家来讲，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

经验。因为很少有机会在几十年之内，看到一个新的共同体，它的政治制度，它的政治文化发生。

**张：**但是，为什么这么容易被镇压？

**白：**因为中国，就像特朗普说的：“You haven’t got the cards, he’s got the cards”(你手里没有牌，他手里是有牌的)。对中共来讲，即使把整个基本法都违反了，又怎么样？香港国安法本来就是非法的。

基本法只实行了不到二十五年，中共一度利用了基本法，因为香港人非常相信法治。可到了2019年、2020年，基本法已经名存实亡了。这并不说明香港人被说服了，我们可以说软抵抗不存在，但影子还总是存在的。只是这对香港人更难，比国内还要难，因为他们不习惯，他们曾经经历过比较自由的表达，习惯了公开说话。

**张：**最后一个问题，面对强大国家机器，民主诉求是否仍然有可能找到表达的出口？当然你刚才讲了，现在可能是个低潮，影子仍在但没人看得见。或者说，中国未来民主运动会以什么形式“继续存在”？

**白：**现在当然是最低潮了。中国政府是严防死守，它一直都是这样。现在我们处在防守着的一个阶段，这个防守着的阶段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了。

习个人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但我不相信党内全体党员都支持习大大。毛泽东的时候有两条路线斗争，现在看不到什么路线斗争，但是我不相信这个党是铁板一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不会永远维持，但是它的维持

比我想象的时间长。不过，全面控制的现实下还是有一些空间，比如说，在家里谈论还总是可以的。

**张：**私人空间？

**白：**对，又比如现在人们可以出国，还是有一些空间，但是不允许政治讨论进入公共空间。你可以在朋友圈谈论，但不可以在网上公开说。中国不再有新的社会组织，所有所谓的非政府组织都是被政府控制的。面对新形势，中共的社会垄断又恢复了。所以在这方面它成功了。虽说不断涌现出来一些民间新的运动形式，但只要成功了、被发现了之后，它就开始被控制。民间有什么办法？就又变成不公开的了。大家始终处于一种中国人讲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样相互斗争的阶段。就像阴天里的影子，只当它不存在，但是阴天不会一直维持存在、一直挡住阳光，所以我不会完全悲观。白纸运动说明，党哪怕镇压反对声音，这些声音也不会完全消失。

**张：**非常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黄奕信画作